

Study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Consulting

决策咨询研究

项淞学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013035603

D601
51

决策咨询研究

项浙学 著



北航

C164312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D601
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策咨询研究 / 项浙学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81140-748-8

I. ①决… II. ①项… III. ①方针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D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7731 号

决策咨询研究

项浙学 著

责任编辑 钟仲南
责任校对 袁金麟
封面设计 王好驰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748-8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前 言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记述决策咨询活动的文集。它选编了30多年来我在参加决策咨询活动期间,结合这项活动所撰写的论文和决策建议。这些文稿有的是我撰写的,有的是几个同志合写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吸取了团队同志的宝贵意见,所以本书可以说是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策咨询之路是不平坦的。编辑这本文集,是想把决策咨询中遇到的前沿性问题,以及在破解这些问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尽可能较系统地告诉有志于此项工作的青年同志,以作为他们的借鉴和参考。同时,很久以来就想选择一种方式,来感谢帮助开展此项工作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编辑出版这本书,可以向他们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汇报,并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30多年前,我选择这项工作的动因,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文革”初期,先是对领导部门的某些决策产生疑问;隔离期间进而反思“文革”及“文革”前的许多决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从大连工学院调到浙江化工学院工作。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脑海中仍不时回旋着“文革”中的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展开,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应当用更理性的态度对待过去在决策上犯过的错误。作为在大学工作的一名干部,虽然受许多条件限制,但也有一些有利因素,应当而且可以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更加关注经济的发展态势,尤其是科技如何实现与经济社会的结合。所以,在1978—1980年期间,我在承担《无机化学》教学任务的同时,争取机会到企业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不少

企业遇到“关停并转”的问题。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企业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些困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1980年撰写了《在关停并转中要运用辩证法》这篇论文。文中指出,无论是国家计划或企业生产,都要高度重视市场调查和预测,建议企业一定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沿用的直线型模型,即“国家计划—企业计划 and 生产—市场”这样一种模式的束缚,既要重视国家在市场调查和预测基础上制定的计划,又要主动地开展市场调查工作。我们认为,指导企业生产的,应是这种双反馈式的模型。当时经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成立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在全国征集论文,我们这篇文章被评选为中国自然辩证法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学术论文。

在这次全国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上,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受到极大的重视。我在回杭后便向中共浙江省委当时主管工业工作的崔健书记作了汇报,并且建议召开一次浙江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以便找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发展路子。这个建议得到省领导的肯定,于是由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浙江省企业管理协会联合筹备,于1982年12月在杭州召开了浙江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发展经济当然离不开知识。然而“文革”后党的路线虽已发生根本转变,但党内“左”倾错误的流毒依然存在,社会上轻视知识、轻视脑力劳动的现象仍很普遍。有鉴于此,我便把精力集中在研究知识的价值上。可正当我们国家着力纠正蔑视知识和践踏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时,在西方却掀起了一股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潮。被誉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一位著名作者称:“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并且偏执地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① 这些观点不仅在西方流行,而且给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带来影响。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而这两者都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所以否

^①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定劳动价值论也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为此我们选择了知识劳动这个命题,着重探讨了知识与劳动、知识价值与劳动价值、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以及知识性产品与实物性产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知识劳动将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经济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

此后,我与王光铸、李宝泰同志合作撰写了题为《论知识劳动的价值观》的文章。1986年5月接到通知,让我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会会议上宣读这篇论文。在我宣讲以后的当天晚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理论部负责人约我谈话。其中光明日报社的马沛文表示,准备在《光明日报》上登载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建议此文可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我根据马沛文同志的意见对此文作了一些压缩,后发表在《光明日报》1986年5月17日的理论版上。

在这篇论文发表以前,我曾于1984年参加了国务院多个部门联合召开的新技术革命对策研讨会。这次会议历时八天,争论十分激烈,尤其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更是争论的焦点。集中起来,当时有三种观点:一是先搞工业化,再搞信息化;二是抓紧实现信息化,以带动工业化;三是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互动发展。我是主张第三种对策思路的。后来我把这方面的观点吸纳到《论知识劳动的价值观》这篇论文中。

1985年,浙江省政府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科技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的发言,提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把智力开发作为振兴经济的核心。在这次会上,围绕浙江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出现了分歧,有的主张根据浙江经济的条件,在相当时期内应以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有的主张根据国内外形势应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有的同志则主张内外向并重,即发展双向型经济。会后,我们建议专门召开一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研讨会。这个建议为省科协采纳。由省科协主持的外向型经济学术讨论会,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省委领导多次到会直接听取意见。我们还编写了10多份简报,供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与此同时,为加强对外向型经济的研究,1989年5月,在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设立了外向型企业经济与文化专门委员会,不久又在这个委员会基础上创建了浙江省科技促进外向型经

济研究会。

1990年我应邀去扬州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评审会。会议之前得知党中央已作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要求上海市计委介绍这个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所制定的政策措施。然而上海市计委的同志感到为难,但答应参加会议的同志可由他们接待去浦东参观考察。我借此机会在浦东逗留了一个星期,其间听取了上海市同志介绍浦东开发决策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很大启发。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科学决策思想的教育。

浙江应怎样和浦东接轨,是当时的一个重点调研课题。回杭后我就此向浙江省科协全委会作了汇报。建议浙江应抓住浦东开发的机会,从近期看,应大力发展建筑业、运输业、食品加工业和旅游业;同时应谋划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接着,我们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发展新兴产业的四项建议:一是加快发展电子通信产业,使它成为浙江新一代的支柱产业;二是保护萤石资源,加快发展氟化工产业;三是大力发展纳米材料产业,用纳米技术武装传统产业;四是发展产业关联度大的环保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上述四项关于发展新兴产业的建议受到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李泽民书记、万学远省长、柴松岳省长等都分别作过批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受浙江省人大的委托,为起草《浙江省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决策程序条例》提出研究报告。与此同时,受省科委委托,开展“80年代浙江重点经济项目投资合理化和决策优化研究”。这两个课题的内容密切相关。我们从80年代建设起来的项目中选择了100个项目,作为调查和评价的样本;采用系统调查和典型项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剖析失误项目的决策程序问题。让我们吃惊的是,在生产性项目中竟有20%左右出现了重大失误,有几个项目的决策失误更是触目惊心。其中浙江某公司引进柑橘综合加工项目的决策失误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便集中力量对它作系统剖析。通过对这个典型以及其他几个项目的剖析,大体上弄清了经济项目在决策程序上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浙江省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决策程序条例》的设计稿及相关说明,均得到省人大领导的肯定。这项研究还受到中国科协的重视。

中国科协将此项研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书记处领导的指示,由中国科协将此报告转发全国各省科协。

在 1991 年中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的号召。为了判断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迫切需要选择一种定量的测算方法。当时国家计委办公厅发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计算方法的通知》。可当我们按照国家计委通知的要求,对浙江省和一些市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时,却发现采用这种测算方法所获得的结果波动性大,精确度低,可比性很差。这就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索洛方程所设定的几个基本假设。对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来说,这种计算方法的缺陷就显得更加突出。所以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测算方法——流量余值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吸收了索洛方程的优点,另一方面引进了即时生产力的概念,以流量指标代替存量指标,从而大大提高了测算结果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20 世纪 90 年代是浙江专业市场大发展的时期。怎样避免专业市场发展过多过滥,怎样发挥专业市场在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中的作用,是当时我们关注的两大问题。1997 年受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和永康市政府的委托,开展了《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发展规划思路研究》。在科技五金城的定位上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把它定位在专业市场上;二是把它定位在技术一市场系统上。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一定位受到省咨询委组织的专家论证会的肯定。参加论证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浙江作为市场大省,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发展规划思路,对今后全省专业市场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浙江省癌症上升趋势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接受省科委委托的一个重点课题。当时浙江省癌症患者数量和死亡率都在迅速上升,已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死亡率这个数据看,不仅城市居高不下,而且农村的增幅也比较大。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从外源性致癌因素和内源性致癌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既从化学性、物理性、生物性等因素,又从精神、营养、遗传等因素寻找原因。通过系统的分析,确认患者数量和死亡

率上升和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增长,但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这是导致浙江省癌症患者数量和死亡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这项研究报告已作为新华社内参送交领导机关。

为了进一步搞清环境问题,在完成癌症课题以后,我们在承接温州市某民营科技园规划思路的研究中,实地考察了当地的铜、锌、铝加工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加工方法。为此我约了一位企业主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让我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是从当地周边村庄里的青年参军时因肝病而无一录取这个话题开始的。我说从我过去从事的化工专业的角度来看,只要对加工工艺稍加改进,即可大大改善这里的环境。可这位企业主却不以为然;他说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是从全国招来的,几年后将进行轮换。我接着问他,你自己不是也要遭受污染吗?他竟然回答说,几年后我将离开这里,换一个新的地方。

不久,我们又接受绍兴市环保局的委托,开展对绍兴城区环保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现象让我陷入沉思:绍兴市区有 1.8 万亩水域,但其中近 1.3 万亩已用来养殖珍珠;据说各乡镇的积极性都非常高。可是养殖珍珠需要施肥、投饵,这对水质会造成严重影响。在参观过程中,发现周边有些地区腥臭难闻。这使我不得不深入思考这类经济活动效果的二重性:一方面可以快速致富,即产生“外部经济性”,另一方面又会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从而产生“外部的不经济性”。发展珍珠养殖使人们快速致富,但这种经济活动的许多成本已转嫁给社会。怎样认识这种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成本的关系,又怎样以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制止破坏资源和环境的不文明行为,这些问题始终回旋在我的脑海中。

1999 年,全国开展了科研院所的改革。像我省原先具有较强实力的化工院、机械院都实行企业化的转制。这类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后,原先承担的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赴省化工院进行调研。省化工院的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看,院所改制后,应对市场的能力肯定得到加强,然而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相对而言的确有所削弱;改制为企业后,必然要以营利为目的,行业共性技术研

发由于其难度大、周期长,且具有外溢性的特点,所以不会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方向。这些意见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事关浙江经济的发展全局,削弱了共性技术研发,受害最大的将是浙江广大的中小企业。所以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开展了有关共性技术的三个课题的研究。怎样认识共性技术的属性,怎样克服科研院所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怎样看待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 G. 坦森提出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怎样构建符合浙江经济发展特点的共性技术研发体制和机制,这些就是我们当时研究的重点。

加入 WTO 将会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加入 WTO 的前后几年中,社会上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关税减让对各类产业的影响上。我们研究了 WTO 的三大协议(货物贸易多边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知识产权协议)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对关税减让虽应引起重视,但最严重的挑战将集中在科技创新和人才争夺上。以技术实力和技术水平为支撑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将对我国、我省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在 2002 年 12 月组织召开了一次“应对技术壁垒与保护知识产权对策”研讨会。与会同志经过讨论达成了共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要害是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的重点是技术专利,两者的结合形成复合性非关税壁垒,这对我们将是最严重的挑战。为此,我们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以突破技术类非关税壁垒为主题的建议报告。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为贯彻这个战略决策,浙江省在提出实施科教兴省的战略后,省委、省政府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科技强省的目标。科技强省的定义和内涵是什么?科技强省的目标怎样选择?浙江省离科技强省的目标还有多远?为实现这个目标应当采取哪些战略措施?这些都要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省科技厅于 2001 年 10 月将“加快浙江科技强省建设的对策研究”列为重大软科学招标课题。我们在中标后,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加快科技强省建设的总报告和 7 个专题报告。研究报告选择了 20 个 OECD 成员国的统计数据作为目标值研究的基础,建议用 12 个指标组成科技强省考核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省科技强省建设的两步走目标,

即 2007 年使科技强省实现度达到 55% 左右,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本报告提出的建设科技强省的目标。2002 年 6 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引用了课题报告提出的关于科技强省总目标的论述。此课题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建设科技强省的过程中,政府、大学、研究所固然应当承担重任,但企业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意义。为此,我在 2002 年提交了一份“推进企业从模仿型向创新型模式转变”的建议报告,此报告经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组织专家论证后上报浙江省政府。这项专题报告的基础,是我近些年到企业调研所获得的资料。1995 年,省科委、计委、财政厅、地税局联合成立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委员会,我受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每年都规定要参观、考察一批企业,这让我有机会了解这些企业的最新发展。我在调查中发现,我省有许多企业经过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的双重锤炼,已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及处理这几种创新的相互关系上积累了宝贵经验。我的这项专题建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2005 年,党中央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为贯彻这个重大决策,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定位;二是浙江应选择什么样的自主创新道路;三是如何实现制造大省向创造强省转变。在这些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目标的选择。在党中央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后,科技部紧接着提出了四项目标:到 2020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2.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 左右;对外依存度降低到 30% 以下;本国的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第 5 位。这四项目标提出后,经层层传达和媒体的广泛传播,便成为各省构建创新型省份的依据。然而我们对其中有的指标的科学性存有疑虑,所以便着手分析国际上创新型经济体与非创新型经济体的本质区别,在众多指标上找出哪些是特征性指标,哪些则是非特征性指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目标选择的建议。对后两个问题,我们则另撰写了专题报告。

R&D 活动是科技活动的核心,在建设科技强省和创新型省份中起着关键作用。怎样提高浙江省 R&D 投入的强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围绕这

个专题,我们相继承担了两个课题研究:一个是省科技厅委托的,题为“浙江省企业 R&D 投入分析及相关政策措施”;一个是省政府研究室委托的,题为“增加全社会研发投入促进创新发展问题研究”。上述两个课题的研究报告均受到省领导的重视。

为探索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我们相继承担了“浙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和对策研究”“浙江省绿色 GDP 的测算和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优化”以及“低碳约束下浙江外贸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等课题。

为了探明 GDP 的增长对资源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当建立绿色 GDP 的测算制度。而为了尽最大可能降低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则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其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则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完成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和对策的课题研究后,便转向绿色 GDP 的测算和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此课题引起了领导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在该研究报告上作了批示,陈加元副省长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这项成果还被评为 2005 年中国科协优秀调研报告最高级奖励——特别奖。

“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优化,是浙江省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向全国招标的研究课题。在此项研究中,我们着重剖析了一些决策部门在规划工作中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用线性思维认识和处理非线性系统。在经济资源环境这样一个复杂系统中,GDP 代表了经济总量,能源强度和 SO_2 等气体排放强度是资源环境的衡量指标,这些变量之间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小范围的线性关系和大范围的非线性关系是这个系统的基本特征。可是面对这个非线性系统,一些部门却常常采用线性思维来对待它。这是导致许多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系统在其运行中出现严重偏差而不能得到及时纠正的根源所在。

探索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在研究这样的复杂系统时,不仅要注意把握系统的客体,而且要注意与客体相联系的主体,以及这个主体所处的环境。这里说的客体主要是指经济结构、资源环境问题的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主体则主要是指与

客体关系密切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外贸战略、外资战略、产业升级战略等。以时下的浙江外贸战略为例,它究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多大影响,这是需要作出评估的。我们开展“低碳约束下浙江外贸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的课题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想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上找到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

2007年,我们承担了“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的核心问题”研究。在研究中发现从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可以有多条路线,但在众多路线中有一条能发挥主导作用的路线;虽然它不能取代其他路线,但由于它和其他路线的关联度大,渗透性强,影响力突出,实际上发挥着导向作用。为此我们着重探讨了“浙江创造”的目标定位,以及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条明晰的路线。我们认为,揭示和贯彻这条路线,应是实现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的核心问题。课题报告送交省委、省政府后,吕祖善省长作了重要批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严重危害,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经济战略,尤其是美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科技创新政策,企图以创新来重塑世界经济新秩序。在此形势下,浙江省政府研究室于2011年4月委托我们开展“增加全社会研发投入促进创新发展问题研究”。在分析了我省当前的问题后,我们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毛光烈副省长在课题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该课题提出了许多思想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要吸取精华,加强对于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研究、科技资源配置重点的研究和完善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的研究。”此课题获2012年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以上回顾了我参加决策咨询活动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许多难点,对这些难点,应当进行梳理并作出概括。回想起来,最大的难点似乎都集中在以下四类问题上。一类是非常规型决策。要对这类决策提出咨询建议的难度比较大。常规型决策是指在管理工作中重复出现的、例行的决策,用来确定这类决策方案的背景资料大部分是已知的。而非常规型决策一般都具有随机性的特点,所决策的问题无先例可循,也缺乏较可靠的资料和信息。例

如低碳约束下如何构建新的外贸战略,就属于非常规型的决策。这类决策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在局部范围内已经积累了一些可参考的资料,但从总体上看则是一种全新的决策。又如在决策程序的研究中,所涉及的项目几乎都属于常规型的决策,但当深入剖析决策程序中出现某种混乱的原因时,发现它是和决策体制密切相关的;而要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新形势下,如何逐步改善决策体制,则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常规型决策。

第二类是理论观点问题。它关系决策的方向。众所周知,任何决策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但所涉及的理论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只是部分正确,需要对其作出补充修正。例如在构建知识经济这个新范畴时,必须抛弃那种把知识和劳动、知识价值和劳动价值对立起来,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论,否则就会导致决策失去正确的方向。又如要构建共性技术研发的体制和机制,必须对 G. 坦森创建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作出修正。应当肯定他所提出的从基础研究到共性技术再到专有技术的转化原理;但无视从专有技术向共性技术的转化,则说明他的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

第三类涉及已经制定的方针政策,需要对其作出重大调整的决策问题。例如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对原先已经制定和还在实施的为发展内向型经济服务的那些方针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又例如为控制战略资源萤石的过度消耗,必须改变那种以攫取近期蝇头小利为目的的出口导向政策,以及缺乏宏观调控、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否则就难以改变无计划的盲目开采、多头销售、多头出口,生产经营秩序混乱的局面。

第四类是原先的研究方法有严重缺陷,需要进行方法创新的决策问题。例如为探求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必须改变规划工作中长期沿用的还原模式,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非线性思维原则,采用整体性研究模式和双向互动的控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不断优化,最终走出一条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又如在若干假设基础上形成的索洛方法,把它应用到中国当前的特定环境,则会出现较大的误差,所以必须探索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新方法,否则就难以获得比较精确和稳定的

测算结果。

本书选编了 40 件文稿,共分成四编,各编之间有些内容虽有交叉,但基本上构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每编的题目则体现了这一组文稿的主题。

第一编取名为知识劳动,着重阐述下列问题: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论问题。包括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体系,知识与劳动、知识价值与劳动价值、实物性产品与知识性产品的关系,知识劳动价值的实现机制和价值的分配,以及知识的共享性与排他性、非磨损性与磨损性等特性。二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知识经济范畴。包括知识经济与知识劳动的关系,知识经济的定义,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等。三是从资源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过渡形态。包括科技先导型经济的特征,判别科技先导型经济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四是完善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包括正确处理知识流动和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的创造、转移、应用和保护,以及制造业中专利、标准、品牌的相互关系。

第二编取名为共性技术,着重阐述下列问题:一是共性技术在整个技术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共性技术的基础性、共用性、超前性,共性技术与专有技术、基础技术的关系。二是共性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包括准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共性技术在竞争性和排他性方面显示的基本特点。三是共性技术研发在资本运作上的特殊性。包括这类技术供给的“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和企业 在共性技术研究投入上的关系。四是与浙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研发体制机制。包括培育多种类型的研发实体,根据共性技术与专有技术的相互转化原理设计研发路线和政策框架,以及与浙江块状经济和当代三大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交叉融合相关联的研发课题选择。

第三编取名为核心战略,着重阐述下列问题:一是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选择。包括对科技部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四项目标的再研究,在创新型省份的目标选择中增添国际专利和能源强度指标的必要性。二是浙江应选择什么样的自主创新道路。包括自主创新的共同特点以及不同类型自主创新的差异点,浙江自主创新道路应具有的两个显著特征。三是推进企业从模仿型向创新型模式转变。包括创新型模式的特点以及它的运行机制,政府在推进企业向创新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四是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的主导路

线。包括浙江制造与浙江创造的本质区别,“浙江创造”的目标选择,以及这条主导路线的基本特征。

第四编取名为科学决策,着重阐述下列问题:一是决策的利益结构。包括企业经济活动积极的外部性和消极的外部性,决策的短期行为和总体目标的矛盾,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二是决策程序的优化。包括对决策程序不科学性的原因分析,决策程序与决策体制的关系。三是跟踪决策。包括计划与跟踪决策的关系,跟踪决策的难点及后评估的重要性。四是常规型决策与非常规型决策。包括常规型决策和非常规型决策的特征,在常规型决策中蕴藏的非常规型决策,以及在非常规型决策中所含有的常规型决策。

在本书中,还选编了部分领导和专家对课题研究报告和相关论文的评述。增添这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因为决策咨询归根结底是为领导的决策服务的,所以领导对决策建议的批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我们在开展决策咨询的各项活动中,一直比较关注来自领导层面的意见,尽可能收集他们对咨询工作的各种评议,并根据反馈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同时还应认真研究同行专家的评议意见。这些专家掌握相关领域的发展动向,了解决策中的问题,对各种选择具有判断能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改进决策咨询工作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回顾这三十多年走过的决策咨询之路,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曾因一些难点久攻不破而陷入不眠之夜,也曾因决策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而兴奋不已。回想起来,这条决策咨询道路是很不平坦的。所幸的是,我们遇到了国家现代化事业的高速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时期。这是开展决策咨询工作最值得珍贵的条件。同时还应指出,在我们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得到许多领导和同行专家的热心指导、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将无法完成如此众多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的任务。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光明日报社马沛文、鲁淳同志,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俞绍成同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钟林同志,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崔健、吕祖善、毛光烈、郭占恒同志,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吴敏达、丁世祥、朱家良、方民生、周文骞、陆立军、蔡文如同志,浙江省科学

技术协会王启东、钱铭岐、朱长乐、顾申年、鲁善增、朱生保、黄国范、高勤建同志,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周文、蒋泰维、毛继祥、周伟强、徐燕椿、马锦跃同志,浙江工业大学徐德明、王光铸、周怀溪、鲍健强、曹增节、吴伟强、陈玉瑞、沈立晟、林琳、骆春萍同志等,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